



中国报纸

白瑞华 著 王 海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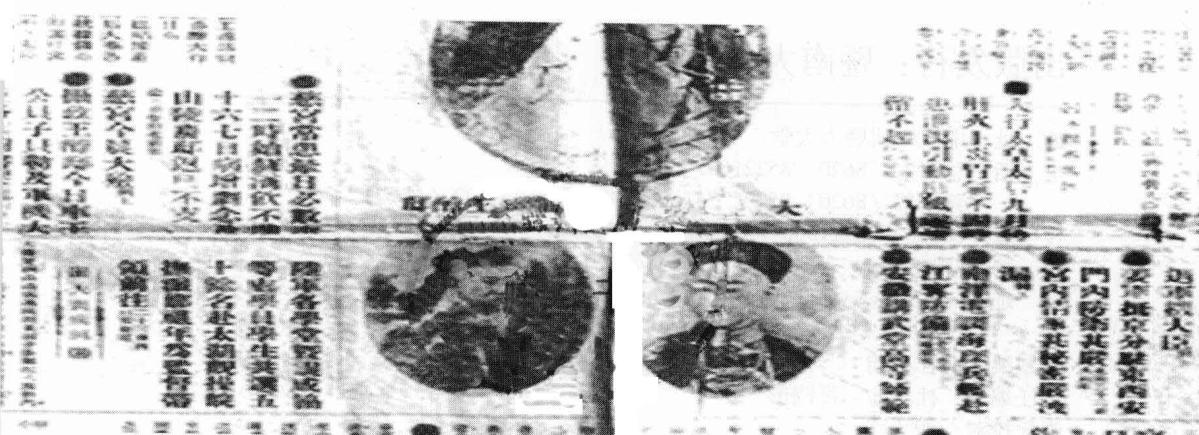
经典新闻学译丛 · 丛书主编 王海

精英 (100) 日新则异

中国报纸 (1800-1912)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白瑞华 著 王海 译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报纸 (1800—1912) / 白瑞华著；王海译.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6

(新闻学经典译丛)

ISBN 978 - 7 - 81135 - 635 - 9

I. ①中… II. ①白… ②王… III. ①报纸—新闻事业—中国—1800—1912 IV. ①G219.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9335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策划编辑：杜小陆

责任编辑：杜小陆 佟晓彤

责任校对：苏倩欣

排 版：弓设计

印 刷：湛江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787mm × 960mm 1/16

印 张：13.75

字 数：210 千

版 次：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6 月第 1 次

定 价：29.8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前　言

本书是关于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而本土报纸消亡时期的报业概览。我认为，在中国近现代报业形成的过程中，本土报纸像国外新闻纸一样发挥着同等功能。这样的观点实在是新鲜，但研究者已对有关事实进行了明确的调查。本书只是关于中国报业的描述，并非专业论著。书中数据基本皆依赖原始的一手材料，笔者不仅查阅了本书提及和描述的大量报刊的样报，甚至还查看了其中某些报纸的完整期刊。因此，书中有可能会省略脚注的引用来源。右上角的上标数字指参考文献，既分辨了第二来源，又表明了额外信息。

这里，我要感谢很多帮助过我的朋友。戈公振先生向我展示了他早期搜集的报刊，我可以无偿地使用这些材料，并引用了其大作中的很多观点^[1]。梁思庄^①、伍朝枢^②、英千里^③、林梅蕊（Alice

① 梁思庄（1908—1986），著名的图书馆专家，梁启超次女。早年留学加拿大、美国，先后获得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学士，历任燕京大学西文编目组长、主任，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译注

② 伍朝枢（1887—1934），字梯云，广东新会人，生于天津，伍廷芳之子。1897年随父赴美国，15岁入西方高等小学，17岁升入大西洋城之高等学校。1905年毕业回国，1908年又以官费派送英国留学，先后入伦敦大学和林肯法律研究院学习，获法学学士学位和大律师资格。1912年回国，先后在政府担任要职，尤其是外交官职。1934年1月3日病逝于香港。——译注

③ 英千里（1900—1969），名骥良，北京人。英敛之之子。13岁即被父亲托雷鸣远神父带往欧洲去留学。1921年，英千里自伦敦大学毕业后回国，协助父亲筹办辅仁大学。1927年起，任辅仁大学教授兼秘书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平教育局长及社会教育司司长，1949年赴台湾后任教于台湾大学、辅仁大学。一生致力于哲学、逻辑学的研究，著有《逻辑学》等。——译注

Allen)^① 和傅步兰 (George B. Fryer)^② 等提供了其父辈的有关信息，他们的父亲分别是梁启超、伍廷芳、英敛之、林乐知 (Young J. Allen)、傅兰雅 (John Fryer)^③。海军将领蔡廷干^④从个人的珍藏中提供了有关黄胜^⑤的信息。华盛顿中国公使馆的官员友好地安排驿

① 林梅蕊 (Alice Allen) (生卒年不详)，美国监礼会教士林乐知的女儿，曾在中国创办最早的女学之一——经正女学，担任西文总教习并讲授英语、算术、地理、图画等课程。——译注

② 傅步兰 (George B. Fryer, 1877—?) (又译傅步雅)，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傅兰雅的女儿，1877 年出生于美国，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教育家。傅兰雅于清宣统三年 (1911) 创办上海盲童学校，1912 年傅步兰从父命来沪接办盲童学校，并主持工作历时 38 年，于 1949 年 9 月退休。1950 年 4 月，傅步兰离沪取道天津转香港回国。——译注

③ 傅兰雅 (John Fryer, 1839—1928)，出生于英格兰海德镇，圣公会传教士。傅兰雅于清咸丰十一年 (1861) 到香港，任圣保国书院院长；两年后，受聘任北京同文书馆英语教习；清同治四年 (1865)，任上海英华学堂校长，主编字林洋行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同治七年 (1868)，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编译《西国近书汇编》；清光绪二年正月二十三日 (1876 年 2 月 17 日) 创办格致书院，自费创刊科学杂志《格致汇编》；光绪三年 (1877) 担任上海益智书会干事，从事科普工作；光绪二十二年 (1896)，担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东方文学语言教授，后加入美国籍；翻译和合译西方科技书籍 129 部，是在华外国人中翻译西方书籍最多的人。清政府曾授予其三品官衔和勋章。——译注

④ 蔡廷干 (1861—1935)，字耀堂，广东省香山县上恭都上册村人 (今珠海市香洲区金鼎镇外沙村)。清同治十二年 (1873)，参加第二批幼童赴美留学，先后入哈德福语文学校与新不列颠高等学校。清光绪七年 (1881) 归国，入李鸿章创办的塘沽水雷学堂学习，结业后充派福建南洋水师。清光绪十一年 (1885) 中法战争中，蔡廷干调至北洋水师，于清光绪十八年 (1892) 任福龙号鱼雷艇管带、领都司衔。清宣统三年 (1911)，蔡廷干被任命为海军部军制司司长，复补三品京官。民国元年 (1912) 1 月，蔡廷干任袁世凯的海军副官，协助袁逼清退位，被提升为海军副司令。袁世凯死后，蔡廷干任北洋政府关税修订委员会主任、总统府大礼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华洋义赈会运输及财务处处长、北京扶轮会会长、中国赴美留学生会会长、税务处督办、外交总长、内阁代总理、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等职。民国十六年 (1927) 后辞官，转而研究国学，英译老子《道德经》和唐诗三百首，在美国发表后蜚声学界。著有《老解老》、《唐诗英韵》等。民国二十四年 (1935) 在北平逝世。——译注

⑤ 黄胜 (1830—?)，名达权，号平庸，广东香山 (今中山) 人。幼居香港，早年就读于澳门马礼逊纪念学校。1847 年在该学堂美籍教员的带领和香港《德臣西报》的资助下，赴美国马塞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学习。1848 年因病回香港，在德臣西报社学经营管理和印刷业务。后任伦敦布道会印刷厂总管。1869 年被推为东华医院倡建总理之一。次年，任香港《华字日报》主笔。1871 年与王韬一起开办中华印务总局。1874 年参与创办《循环日报》。——译注

站配合调查。蒋廷黼^①在北平档案馆未出版的文献中发现袁德辉的名字，并与亨德（Hunter）^② 回忆录中的名字小德（Shaow Tih）^③ 进行

① 蒋廷黼（1895—1965），中国历史学家、外交家。1911 年由教会资助赴美求学，先后就读于派克学院、奥柏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获哲学博士学位。1923 年回国，先后任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他主张在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过程中兼采中外史学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一套对近代中外关系变化如何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看法，重视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译注

② 亨德（William C. Hunter, 1812—1891），美国商人，1829 年至 1842 年在广州旗昌洋行工作，著有《番鬼在广州》[An American in Canton (1825—1844)]、《旧中国杂记》(Bits of Old China)。——译注

③ 袁德辉，小名小德，原籍四川，天主教徒，在槟榔屿罗马天主教所办的学校学过拉丁文。1830 年夏，由清廷派往广州收集外国书籍。1838 年再次到广州。1839 年，被林则徐聘入府中做译员。——译注

了分辨^[16]。胡霖①、黄宪昭②、汪英宾③、《大陆报》的许建屏④、福

① 胡霖（1889—1949），字政之，以字行。新记《大公报》的创办人之一，任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译注

② 黄宪昭（Hin Wong，即 Huang Hsien Chao），1888 年生于檀香山，父母都是广东人。曾就读于瓦胡岛普纳荷学院。1900—1911 年入哥伦比亚大学，1912 年获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士学位，是密大毕业的第一位华人。先后担任路透社驻广州和香港记者、美联社驻广州记者、上海英文《大陆报》记者、英文《广州时报》主笔、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沪江大学新闻系主任。1921 年，曾作为中国报界六人代表之一，赴檀香山参加第二届世界报界大会。——译注

③ 汪英宾（1897—1971），别名省齐，安徽婺源（今江西省）人。1917 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系读书，获文学学士学位。1920 年 9 月起，在申报馆担任协理。曾由申报馆派往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进修，获硕士学位。1924 年秋末冬初，与戈公振创办上海南方大学报学系与报学专修科，任系主任；1925—1929 年间，兼任光华大学、沪江大学商学院报学系教授。一度为上海联合广告公司董事。1932—1935 年先后担任《时事新报》编辑主任、总经理。1947 年重返新闻界，任上海《大公报》设计委员。1950 年担任圣约翰大学新闻系教授。1952 年 9 月院系调整时，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1959 年 7 月被“下放”到新疆八一农学院任英语教员，1971 年病逝。著有《美国新闻事业》、《中国报业之觉悟》等，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本土报纸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ative Press in China*）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本记述‘中国新闻史’的著作”。——译注

④ 许建屏（1889—1968），字鉴平，浙江嘉兴人。1907 年毕业于上海华童公学，同年参加剑桥大学在上海的首次招生考试，这次考试仅有 5 名中国学生参加，许建屏顺利通过。1908 年起任上海一家外国律师事务所的翻译。1909 年任上海《渝商报》记者。1910 年通过清华留美预科学校招生考试，赴美留学，入密歇根大学。1913 年获考夫曼讲演奖（Kauffman Medal），同年开始任密大校报《密歇根日报》（Michigan Daily，1890 年 9 月 29 日创刊）编辑。1914 年毕业后担任《底特律论坛报》（Detroit Tribune）新闻版助理编辑。1915 年初回国，从事律师工作。1917 年应邀担任英文《大陆报》编辑。1921 年出席檀香山万国报界大会及华府会议。1922 年任《大公报》主笔、《大晚报》总经理等职。1928 年任国民政府工商部秘书。1934 年担任财政部总务司司长。1943 年任汪伪中央储备银行调查处处长、中央信托公司总经理等职。1943 年任汪伪中央保险公司经理。——译注

开森 (John C. Ferguson)^①、卡尔·克劳 (Carl Crow)^②、柏德逊 (D. D. Patterson)^③ 等人根据我的要求准备了书稿的相关信息，提供了他们的著作或者复印版。布克尔 (A. W. Burkill)^④、义理寿 (I. V. Gillis)^⑤、金多士 (Gilbert McIntosh)^⑥、倭讷 (E. T. Chalmers)

① 福开森 (John Calvin Ferguson, 1866—1945)，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城，父亲为教会牧师。自幼随家移居美国。1886 年毕业于波士顿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887 年到南京，在估衣廊居所办校开课。1888 年，美国美以美会创办汇文书院，受邀出任院长。1896 年，李鸿章幕下重臣盛宣怀在上海创建南洋公学，受聘出任监院之职，参与创建工作；翌年，辞会文书院院长职务，出任南洋公学监院（院长），直至 1902 年。1898 年受聘为两江总督刘坤一幕僚。1899 年创办《新闻报》。1900 年兼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参与策划东南互保。1902 年参与修订中国对日对美条约。1908 年到北京任邮传部顾问。曾出任华洋义赈会会长；1901 年中原大旱，募得赈灾金约 100 万美元，被清廷封赐为二品顶戴。1921 年奉派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顾问参与遏制日本在华扩张的华盛顿会议。1943 年福开森被日本遣送回美国，1945 年在波士顿去世。——译注

② 卡尔·克劳 (Carl Crow, 1884—1945)，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是民国时期活跃于中国新闻界的著名报人和企业家，《大美晚报》的发起创办人之一。从 1911 年到 1937 年，卡尔·克劳定居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广告公司——卡尔·克劳公司 (Carl Crow, Inc.)，经营达 19 年之久，首创老上海美女月历牌。卡尔·克劳是坚定的亲华抗日分子，见证了中国近代许多重要历史事件。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卡尔·克劳撰写了《我为中国人说话》(I Speak for the Chinese)、《四万万消费者》(Four Hundred Million Customers) 等大量关于中国报业、商业、宗教和文化的著作。他去世前仍有很多书稿未出版。

③ 柏德逊 (D. D. Patterson)，美国人，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曾担任上海英文报《密勒氏评论报》主笔；1920 年 9 月，帮助中国创办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受聘担任系主任。——译注

④ 布克尔 (A. W. Burkill)，英商祥茂洋行经理。祥茂洋行是代理经租英商英法产业公司所有房地产业务的较大英商企业。——译注

⑤ 义理寿 (Irvin Van Gillis, 1875—1948)，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顾问和代购人。曾任美国驻华公使馆海军上校。——译注

⑥ 金多士 (Gilbert McIntosh, 1861—?)，美国基督教长老会驻华教士。著有《差会在华出版机构》(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 (1895)、《中国的危机与基督教传教士》(The Chinese Crisis and Christian Missionaries) (1901)、《上海美华书馆六十年概述》(A Mission Press Sexagenary) (1904) 和《美华书馆七十年》(Septuagenary of the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14)。——译注

Werner)^① 和孟治 (Paul Chih Meng)^② 帮忙润色书稿并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

伯希和 (Paul Pelliot)^③ 给我提供了关于《京报》和中国印刷品的某些有用观点和建议。贝托尔德·劳费尔 (Berthold Laufer)^④ 耐心地回答我的疑问。在北平国家图书馆，袁同礼^⑤为我的工作提供便利，并引导我关注参考文献中第 127 ~ 140 条的内容。翟林奈 (Lionel Giles)^⑥ 在英国博物馆为我的工作提供便利条件。王际真^⑦不厌

① 倭讷 (E. T. Chalmers Werner, 1864—1954)，英国著名汉学家。1937 年间曾生活于中国北京。1922 年，出版《中国神话和传说》(Myths and Legends of China)。——译注

② 孟治 (Paul Chih Meng, 1900—1990)，孟子 72 代孙，原华美协进会第二任会长。生于北京，清华大学肄业。1919 年五四运动中曾因组织学生到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段祺瑞政府参加“一战”而被捕入狱。同年，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30 年起担任华美协进会会长，直至 1967 年退休，长期为中国留美学生募集善款和奖学金。——译注

③ 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法国著名汉学家和探险家。1878 年 5 月 28 日生于巴黎。曾就读于巴黎大学，主修英语，后入法国汉学中心学习汉语，继入国立东方语言学校，专攻东方各国语文历史。曾师从法国汉学家 E. E. 沙婉 (1865—1918)，致力于汉学研究。——译注

④ 贝托尔德·劳费尔 (Berthold Laufer, 1874—1934)，德裔美籍人类学家、东方学家、语言学家和艺术史学家，出生于德国科隆一个犹太人家庭。1897 年获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1898 年移民美国。1934 年逝世于芝加哥。——译注

⑤ 袁同礼 (1895—1965)，字守和，河北徐水县孤庄营村人，图书馆学家和目录学家。出生于北京，191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并进入清华学校图书馆（今清华大学图书馆）参考部工作。他于 1917 年升任清华学校图书馆主任，于 1918 年获选为北京图书馆协会会长。1920 年，他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之后，入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学习，获图书馆学学士学位。1923 年之后，他前往欧洲各国考察图书馆与博物馆。1924 年回到中国，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并讲授目录学。同年，前往广州担任广东大学图书馆馆长，并获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书记。——译注

⑥ 翟林奈 (Lionel Giles, 1875—1958)，著名翻译家和汉学家，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史专家。1910 年曾完成《孙子兵法》的第一个英译本 *The Art of War*。——译注

⑦ 王际真 (1899—2001)，字稚臣，原籍山东省桓台县索镇马家村。1922 年，赴美国学习，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和新闻学，后在哥大任教。他是第一位将《红楼梦》节译为英文的华人。——译注

其烦地批评我并指出翻译中的很多错误。卢祺新^①、翁长平^②和颜福庆^③帮助我查找和运用中文资料。赵锡禹^④曾与我合作编纂《北京日报目录》(Directory of Peking Daily Papers)，他阅读了该书稿，并在很多方面给予了帮助。戴闻达 (J. J. L. Duyvendak)^⑤仔细审读了两次书稿后，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并加深了与荷兰莱顿汉学院的联谊。罗斯科·布郎 (Roscoe C. E. Brown)^⑥、沃尔特·B. 皮特金 (Walter B. Pitkin)^⑦ 和蔡尔兹 (John L. Childs)^⑧ 对书稿提出了善意

① 卢祺新 (生卒年不详)，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获新闻学硕士学位。归国后曾任职于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他是第一个获得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服务报业杰出个人奖章的中国人。1941 年代表《大公报》在美国接受“密苏里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译注

② 翁长平 (音译)，此人生平不详。——译注

③ 颜福庆 (1882—1970)，字克卿，祖籍厦门，清末民初外交家颜惠庆的弟弟。1906 年，颜福庆被选到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深造，于 1909 年获医学博士学位，是耶鲁大学第一个获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译注

④ 赵锡禹 (1901—1970)，直隶 (今河北) 乐亭人。1925 年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研究生毕业。1929 年获美国纽约大学商学硕士学位。曾任商务印书馆研究所研究员，辅仁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燕京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财经金融学院 (今中央财经大学) 教授、会计系主任兼企业财务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财政系主任、图书馆第二馆长。专于工商管理和西方财务会计学，著有《资本主义会计学专题讲座》。被誉为最早介绍西方现代会计理论的学者。——译注

⑤ 戴闻达 (J. J. L. Duyvendak, 1889—1954)，荷兰人，中世纪中国史的学者。主要著述有《商君书》(1928)，既是《商君书》的研究专著，又是《商君书》的译本。——译注

⑥ 罗斯科·布郎 (Roscoe C. E. Brow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1922 年与人合著出版《纽约州政治制度和政府机构的历史》(Histor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Political and Government)，对新闻学颇有研究。——译注

⑦ 沃尔特·B. 皮特金 (Walter B. Pitkin, 1878—1953)，生于密歇根州，卒于加州帕罗奥多。1905 年到 1909 年曾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讲师，1912 年到 1943 年任该校新闻学院教授。撰写以《人生始于 40 岁》(Life Begins at 40) 为代表的多部自助书。——译注

⑧ 蔡尔兹 (John L. Childs, 1889—1985)，生于威斯康星州奥克莱尔市。20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纽约进步运动领袖。1911 年毕业于威斯康星州立大学，获新闻学学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生前两次来华：1919 年以美国基督教青年会教士身份来华工作，1922 年初返美；1924 年 8 月再度来华。——译注

的批评。富录特 (L. C. Goodrich)^①、埃瓦茨·格林 (Evarts B. Greene)^②、恒慕义 (Arthur Hummel)^③、罗伯特·林德 (Robert Lynd)^④、毕格 (Cyrus H. Peake)^⑤、肖特韦尔 (James T. Schotwell)^⑥ 和王克私 (Philippe de Vargas)^⑦ 等阅读了部分或者所有书稿，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和评价。我独立负责书稿的最后校对。非常感谢我的弟弟托马斯·C. 布里顿 (Thomas C. Britton) 将本书付印。

白瑞华

1933年7月于纽约

① 富录特 (L. C. Goodrich, 1894—1986)，又译作傅路德，生于北京通州，美国大学教授富善之子，双亲均为传教士。美国东方学、汉学界的领袖人物。生前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荣誉教授，美国东方学会会员（1945年任副会长，1946年任会长），亚洲研究协会会员（1955年任副会长，1956年任会长）。——译注

② 埃瓦茨·格林 (Evarts B. Greene)，美国人。20世纪30年代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译注

③ 恒慕义 (Arthur Hummel)，著名汉学家。1915年，被美国基督教公理会派到中国，在山西汾州（今汾阳）明义中学教英文。1928年，回到华盛顿，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东部首任主任。1957年，他与郭秉文创办中美文化协会，任主席。——译注

④ 罗伯特·林德 (Robert Lynd, 1879—1949)，英国批评家、散文家。生于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曾在当地的皇后学院就学。迁居伦敦后，担任《新闻记事》的文学编辑。——译注

⑤ 毕格 (Cyrus H. Peake, ?—1983)，美国学者，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市。20世纪上半叶，与费正清等人在美国掀起关于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初步奠定了美国的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格局。——译注

⑥ 肖特韦尔 (James T. Schotwell, 1874—1965)，美籍历史学家，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先后就读于多伦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于1900年取得哥大博士学位。曾代表美国政府参加巴黎和会，为威尔逊总统的外交顾问团成员。——译注

⑦ 王克私 (Philippe de Vargas)，瑞士人。1913年到1920年担任北京、济南、武昌和汉口等地中华基督青年会干事。1920年到1941年、1945年到1948年任燕京大学神学和史学教授。——译注

目 录

1	总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中国本土报纸和京报
18	第二章 西方报刊进入
35	第三章 中国人对外报的反应
46	第四章 王韬和香港报纸
52	第五章 通商口岸的外报
70	第六章 《申报》和上海报纸
82	第七章 大众报纸的崛起
92	第八章 梁启超和维新派报纸
105	第九章 政府和新闻改良
116	第十章 革命派报刊
126	第十一章 新报刊和旧报刊
139	参考文献
156	报刊索引
166	人物索引
174	附 录
198	译后记

第一章 中国本土报纸和京报

早在 19 世纪之前，中国本土模式的新闻纸就已经成熟。中国新闻纸的雏形似乎先于除罗马之外的任何国家。在公元 618—907 年（原书为 906 年）的唐朝年间，皇宫新闻以类似公告的单页新闻信发行。戈公振在原始文本《中国报学史》中给出了文献证明^①，梅辉立（Mayers）^②也撰文就此作出明确阐述。^[26]。这些手抄单页新闻信就是集成出版物京报的肇始者。它们的创刊时间只是推测的，其形式类似于公元前 60 年前后在罗马出现的《每日纪闻》（*Acta Diurna*）手抄本。中国早期的统治者具有发布公告的惯例，甚至早在公元前 221 年秦朝统一之前，一些皇帝就习惯把其命令和公告张贴在公共场所，由于只有很少的臣民能够阅读，所以，传统上，皇帝总是派人专门设计带有插图的公告，以便于文盲阅读。在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 220 年汉王朝统治时期，一种周密的手抄记事机制应运而生。或许，长安和洛阳的汉语抄写员就像罗马的誊写员那样为地方订户提供抄写服务，而且很大程度上按照同样的方式进行。在尚未成熟的新闻信过渡到印刷品和报纸之前，罗马沦陷了。而在中国，手抄新闻信发展成为一种机构，这种机构作为帝国有机的组成部分，发挥着巨大功能。印刷术应用于新闻纸业务可能是在北宋（公元 960—

① 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引用唐人孙樵《经维集·读开元杂报》的内容。——译注

② 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1831—1878），又作迈耶斯，19 世纪中期英国汉学家。曾任驻华外交官，1895 年来华，著有《汉语指南》、《中外条约集》、《中国政府——名目手册》等。——译注

1127 年) 年间, 明朝一定是在公元 1368—1644 年间。

在 19 世纪之前, 刊载各类煽情新闻的大众化单页手抄新闻信出现了, 在大街上零售发行。这些单页手抄新闻信就像 1600 年前后伦敦街头出现的单张民谣印刷品一样, 频繁地在城市发行, 但并不定期。手抄新闻信带有插图。像《嘉定报》(见图 10, 11) 这种刊登官方和普通新闻的定期出版物, 在 19 世纪的中国绝对是稀少的。但是, 由于印度受惠于中国文化, 这种报纸在印度支那诸国出现了。这样的事实至少暗示了: 这种定期出版物在中国曾经存在。下面的论述仅仅适用于 19 世纪的中国, 当时中国这个封建帝国正走向没落, 其艺术和学术总体上低于以前的水平, 即使对于京报这个古代高度规范化的文化机构也是一样, 这一点可以从乾隆时代法国人龚当信 (Cyr Contancin)^① 和其他 18 世纪观察家的记录中找到相关例子^[2]。这些观察家认为, 中国 18 世纪的新闻信比 19 世纪的新闻纸有更多的优点。

至于中国报纸的局限性, 最明显的原因就是公众识字率太低, 估计在 3% ~ 5% 之间。这个估算可能过低, 可以阅读的公众数量在 1 000 万 ~ 2 000 万之间, 其中很多人对新闻几乎不感兴趣, 或者很少关注新闻。中国知识分子倾向于反思, 沉浸于对成熟文化的历史思考, 并不关注现在或将来。他们普遍希望将来得到某一官职或者成为商人, 他们采取一种保守态度, 很少关心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 更不关注国外的状况; 这个帝国的自然的地方心理不仅是完全地自给自足和依赖世界, 而且形成本国内部一个个独立的地方单元。帝国几乎没有旅游或者内部交流, 驿递服务昂贵, 公路体系就像一则中国谚语所描述的那样——“好路十年走, 坏路万年转”。民众对于邻里之外的世界充满了好奇, 一点也不关心报纸中有趣的重大新闻。

^① 龚当信 (Cyr Contancin, 1670—1733), 法国传教士。1710 年来华, 初驻广州, 1711 年进京, 1731 年回国。——译注

很多有意阅读新闻的识字人却买不起报纸。租赁报纸在北平和一些省城是很普遍的做法。当时，中国经济阻碍了报纸出版，进而削弱了报纸社会功能的发挥。印刷是廉价的，无论新闻纸还是本土报纸的印刷成本都很低。但是，没有广告和资助来填补这笔小开支。中国缺乏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的环境。在这片土地上，几乎没有哪个地方的公众愿意购买报纸。中国的报馆只有依靠订阅和街头零售的收入来弥补开支并取得利润。支付广告费用与中国报纸的运营好像无任何干系。招贴广告在中国是普遍的，而租赁招贴广告的地段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更不用说购买报纸版面了。当时，中国有代金券、购物卡和盖有印章的包装纸用作店铺推宣单，也出现前胸后背挂着广告牌在街头吆喝来帮商家招揽顾客的人。但总体说来，当时的广告特点是少量非物质产品的广告订单，主要的广告主无非是江湖郎中和药师，以及马戏团、说书者、算命先生和客栈酒店。在高度自给自足的人口当中，生活必需品无须广告促销。对于普通商铺而言，在门口挂个幌子就足够了。尽管华丽的招牌很多，但这并非最好的广告诉求。市场供给和需求的交易处于卖方市场的条件下，不需要精心设计烦琐的销售策略，或者引介新产品、兜售剩余产品的促销活动等。地方市场营销、手工作坊式生产、行会对于大宗产品的控制，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正常的经济运行，根本无须大肆宣传和广告推销。产品质量越好，就越不需要展示和促销。在法国，整个情况刚好相反。《公告杂志》（*Le Journal Général d'Affiches*）于 1612 年在巴黎创刊，后更名为《小广告》（*Les Petites Affiches*），它是一种悠久的专门刊登广告而非新闻的法语期刊。

整体而言，政府支持报业发展，但宣扬专制独裁、攻击政府的印刷品被认定是暴乱或叛国，这是必然的。淫秽小说受到禁止，但仍然在流传。无论怎样，报业享用了新闻自由的所有优势和劣势。当时的印刷业没有独裁式垄断、事前审查，无须印花税、营业执照，

甚至不用注册。同时，有力保障报业言论自由的宪章也不存在。法律允许公众针对官员进行的集会游行。例如，在 19 世纪末，武汉渡船工人集会抗议湖广总督张之洞引入蒸汽船摆渡，排挤了他们赖以谋生的人力渡船，这场集会得到了官方许可。人们把招贴隐秘地贴在公共场所，甚至张贴在衙门围墙上，这是他们对某些无聊和腐败官员发泄不满的传统方式。关于版权，没有任何相应的法律条款。运用汉字的中国人真正具有共产主义精神，他们认为在写作和出版行业根本就没有私有产权。当时中国没有专靠采写原创消息来谋生的职业，但抄写成为一个大行业。

帝国的统治阶层并非通过津贴、新闻审查或任何其他伎俩，而主要是通过控制公众对朝廷的信息需求这种更深入有效的方式来实现其政权统治的，这成为中国新闻纸的特点。朝廷每天公布官报中的政事信息，以供给民间报纸之需，唯一的限定就是报纸必须逐字记录朝廷事宜并以规定的形式发行。公众对朝廷的即兴批评是不允许刊登的，朝廷专门设立了一个监察和报告行政违法的审查机构。都察院（明清后称御史台）御史的条陈成为公开出版的官报的重要组成部分，且经常占据版面相当大的比例。

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这些报纸都有自己独特的印刷设备和各种印版，包括传统木版印刷、石膏泥版和黄蜡树脂蜡版^[99]。泥版和蜡版原料都十分柔软、无纹理，比木版更容易雕刻，而且可以重复使用。而印刷时间和成本的节省是以降低印刷物的清晰度和美观为代价的。熟练的泥版刻工可以如期雕刻出反转汉字，不用在透明纸上备份，只是把版面倒贴在模板上即可^[11]。凸版印刷术通常都是木雕版，可用来印制要求更高的邸报，也可用来印制各类缙绅录——季节修订官员名册。在 19 世纪，手抄新闻信依然大量存在，而且通常比印刷新闻纸的成本高。单页新闻纸通常由泥版或蜡版印刷，在特殊情况下，当预计大量销售或者需要印制套色插图

单页报纸时，将使用耐久的木制版。印工们根据设计需要，将颜料轻敷在单独的模板上，印刷出不同颜色。

大众新闻印刷品叫新闻纸，即报纸。每当有价值的新闻出现时，新闻纸就在大城市出版发行。这些新闻纸被沿街叫卖，一两个铜币一份，有时候套印了彩图的报纸要卖 5 个铜币。这些报纸的内容局限于僵化的新闻，专门迎合愿意为新闻故事支付一小笔钱的读者，并且只有当这些新闻有趣时他们才阅读。中国经济的特点决定了整天刊登单调新闻的报纸根本没有生存空间。每份单张报纸通常包含一个独立的故事，偶尔刊登可能由相关故事组成的系列新闻。这样的出版物尚未形成一种独立行业，只能成为印刷商的副产品，但在 19 世纪初的广州，它们却显示了企业化发展的良好前景：

该出版物刊登诸如地震、饥馑、外敌入侵或者战役、暴徒的不法行为或者类似事件（除了有关政治或者朝政的批评）。实际上，这些显著事件立刻就会刊登在一张小型单页新闻纸上，有时候带插图。在大街上，你突然听到有人高喊，可能就是报童在叫卖报纸……1828 年，我们在广州听到的第一条新闻就是法国领航“圣·阿罗门”（Saint-Rowman）号遭遇海盗袭击，就是依靠这些单张新闻纸获取的信息……英国船只“特拉沃顿”（Troughton）号于 1835 年 1 月在海南附近海域遇难的事情，也是这种新闻纸最先报道的。

亨德《旧中国杂记》，第 216 页

涉及官员的新闻将以轻快的笔调来采写。马礼逊（Robert Morri-